

随园雅食

●周维强



藕香榭宴吃螃蟹

得意，而我散席还家，仍煮粥充饥，可想见其席之丰而不洁矣。南朝孔琳之曰：‘今人好用多品，适口之外，皆为悦目之资。’余以为肴饌横陈，熏蒸腥秽，口亦无可悦也。”上菜前后四十余种，袁枚散席还家还得煮粥充饥。这四十余种菜品，可不就成了“目食”？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看的。袁枚说的是“戒目食”，我们今日也未始不可理解做“戒浪费”。

这一章里的《戒落套》，也说得在理：“唐诗最佳，而五言八韵之试帖，名家不选，何也？以其落套故也。诗尚如此，食亦宜然。今官场之菜，名号有‘十六碟’‘八簋’‘四点心’之称，有‘满汉席’之称，有‘八小吃’之称，有‘十大菜’之称，种种俗名，皆恶厨陋习，只可用之于新亲上门，上司入境，以此敷衍，配上椅披桌裙，插屏香案，三揖百拜方称。若家居欢宴，文酒开筵，安可用此恶套哉？必须盘碗参差，整散杂进，方有名贵之气象。余家寿筵婚席，动至五六桌者，传唤外厨，亦不免落套。然训练之卒，范我驰驱者，其味亦终竟不同。”宴客讲排场，几大碗几大碟几大簋，点心必多少道，小吃必多少味，袁枚一概判之为“恶厨陋习”。家居欢宴，文酒开筵，哪用得着这样的俗套？

我看袁枚的这几条“戒单”，有一个共同的品质：清雅。这也应该是和袁枚的诗歌审美品质相一致的。和清雅相反的，或者就是俗气了。袁枚的美食趣味、餐桌礼仪今天也是我们可以有益的提醒的。

“美食不如美器。”袁枚对这句话也有具

体的阐明。《须知单》这一章有《器具须知》一条：“古语云：美食不如美器。斯语是也。然宣、成、嘉、万，窑器太贵，颇愁损伤，不如竟用御窑，已觉雅丽。惟是宜碗者碗，宜盘者盘，宜大者大，宜小者小，参错其间，方觉生色。若板板于十碗八盘之说，便嫌笨俗。大抵物贵者器宜大，物贱者器宜小；煎炒宜盘，汤羹宜碗；煎炒宜铁锅，煨煮宜砂罐。”袁枚对器具的阐发，也正如对餐饮的阐发，贯穿了一个核心理念，即自然、随意，顺着食材的本性，不刻意，不造作，不摆谱。这和他所提出的餐桌上礼仪的清雅品质相贯通。袁枚在《戒穿凿》这一条里借批评《尊生八笺》之秋藤饼、李笠翁之玉兰糕的“矫揉造作，以杞柳为杯棬，全失大方”，而正面提出自己的饮食理念：“譬如庸唐庸行，做到家便是圣人，何必索隐行怪乎？”曰常道德行为，做到家了便可成为圣人，何必汲汲求索食物隐僻之理，特意弄得稀奇古怪。袁枚这段话里的“以杞柳为杯棬”，典出《孟子·告子上》，意思是：杞柳柔韧，枝条可编器物，可假如拿来制作杯盘，就损害了杞柳的本性了。袁枚顺其自然的烹饪理念，清代学者、官员梁章钜也很认同。遍耀东写明清文人食谱的文章里引了梁章钜的话：“《随园食单》所讲求烹调之法，率皆常味，并无山海奇珍，不失雅人清致。”平常食材，烹饪得法，烧出至味，是为大厨。不然，那倒真是雅得俗了。我想起在启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里历史学家陈垣说过的一个意思，做学问主要不在于有没有拿到人所未见的珍稀材料，

而要人所共见的平凡书中，发现问题，提出见解，这才是真功夫。或者烹饪和学术也有共通之处？

袁枚有一篇散文《戊子中秋记游》，里面写到了他请客人在随园吃猪头。乾隆戊子年，即乾隆三十三年（1768），袁枚53岁。文章说“乾隆戊子中秋，姑苏唐眉岑挈其儿主随园，数烹任之能，于蒸羹首也尤”。羹首即猪头。苏州人唐眉岑擅长烹饪，尤其拿手蒸猪头。“主随园”，我理解是“主厨随园”“掌厨随园”的意思。苏州人唐眉岑应该是袁枚随园新请的家厨。“月大明，奠定酒良，羹首如泥，客皆甘而不能绝于口以醉。”中秋圆月清辉之下，菜熟酒醇，猪头蒸得烂如泥，客人吃猪头停不了口，大家都喝醉了。袁枚感慨万千：“噫！余过来五十三中秋矣，幼时不能记，长大后无可记。今以一羹首故，得与群贤披烟云，辨古迹，遂历历然若真可记者。然则人生百年，无岁不逢节，无境不逢人，而其间可记者几何也！”吃蒸猪头，让袁枚这么慨意顿生，可以想见这猪头烹制得如何美味了。这篇散文可以见出袁枚对吃的讲究，以及梁章钜对袁枚食单赞誉的本意。《随园食单》里的《特性单》这一章第一条就是《猪头二法》，讲了猪头的煮和蒸两种烹制方法，不知道《戊子中秋记游》里的蒸猪头，是否就是《食单》里记录的蒸这一种？

袁枚是清代文学家，诗主性灵。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三月初二生于杭州府钱塘县东园大树巷的宅中，卒于嘉庆二年（1797）十一月十七，葬于随园西侧墓地。乾隆四年（1739）袁枚24岁，中进士，二甲第五名，授庶吉士；乾隆十四年（1749），夔倦令令生涯，托病辞官。袁枚尝作《俗吏篇》二诗，罗以民《子才子：袁枚传》以为作于江宁县令任上。《俗吏篇》第二首开头两句即说：“俗吏未必从我始，俗吏亦当从我止。”接下来连着38个句子历数俗吏生活种种之不堪，最后以“何不高歌归去来，也学先生种五柳”作结。袁枚也是明白人。前引袁枚《杂书十一绝句》第十首，后面两句是：“出门事事都如意，只有餐盘合口难。”可以见出袁枚对饮食的讲究。辞掉了“俗吏”职位，袁枚在他的随园里，“以三寸不烂之舌，仔细平章”（《答（尹）相国书》）。“平章”什么呢？“调羹之妙”。“四十年来，颇集众美”（《随园食单序》）而成一部食谱，记录菜肴、点心、饭粥、茶酒的烹调与制作方法三百四五十种。他日得闲，我们或者可以照着仿制一下？我读《随园食单》，常常食指大动。这部食谱的最后一章《茶酒单》，说绍兴酒和汾酒之区别：“绍兴为名参，烧酒为光棍”，“绍兴酒，也学官廉吏，不参一毫假，而其味方真。又如名士耆英，长留人间，阅尽世故，而其质愈厚”（《绍兴酒》），“既吃烧酒，以狼为友”。汾酒乃烧酒之至狠者。余谓烧酒者，人中之光棍，县中之酷吏也。打擂台，非光棍不可；盗赃贼，非酷吏不可；驱风寒，消积滞，非烧酒不可”（《山西汾酒》）。我不善饮，但看看袁枚也说得有趣，像是有些道理，未知善饮者以为如何？

本清源、标本兼治的历程。

为政如此，修身亦然。一个人不论到什么位置，在什么环境下，都不能忘了根本。只有始终守住本心，保持本色，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走得远。《世说新语·德行》记载：东晋殷仲堪做荆州刺史时，生活俭朴，吃饭时饭菜掉到桌上，都要捡起来吃掉。他常教育子弟们：“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意思是说，清贫是读书人的本分，怎么能登高位就忘了本呢！无独有偶，明代“公安三袁”高中进士后，母亲让他们穿着草鞋回家。以此告诫儿子做人不能忘本，为官要守住本心，保持清廉本色。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尽管时代在变，但治世做人的根本不能变。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强根固本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牢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常问自己“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只有这个“本”坚固了，我们的党性才会纯正，政治才会坚定，才会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始终与人民血脉相连、心心相印。

皇皇百余万字的《汉字形体史》面世了，这是陆锡兴教授积50多年研究，继《汉字传播史》《汉字民俗史》《汉字美术史》之后，又推出的中国文科通史中的新成员。

中国传统文科以语言文字学、文学、历史学、哲学为主，其研究内容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其中的汉字可以说是最为璀璨的明珠。

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且一直沿用至今的唯一表意文字，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民族文化的主要传承者。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汉字都是维系汉语不同方言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亚洲汉字文化圈区域融合的重要纽带。

但是，真正的汉字发展史著作过去一直没有问世。汉字发展史研究滞后的主要原因是传世文献所用汉字皆是印制时代的汉字（近现代汉字），而各代实际使用的字形，以前资料缺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代不同材质的文字材料大量出土，流散各国的敦煌文献现已整理出版，这些文献都是手抄本，反映的是当时实际使用的汉字，研究汉字发展史在资料上条件已然成熟。

不过，总体来看，汉字研究存在不够重视理论的问题。商代、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和敦煌文献文字的研究长期以来是汉字研究的中心，研究成果丰厚，基础工作相对成熟。而对魏晋南北朝以后的字形关注较少。秦汉简帛文字方面，疑难字考释工作充分，解决了大量问题，但字形的理论研究，系统研究不足。石刻是秦汉以后除简帛外的大宗文字材料，虽然从宋代金石学兴起即已开始研究，但基本是文献释读工作，而非字形的专门研究。石刻文献的集中整理出版是近些年的事，而石刻字形的系统研究应当说才刚起步，且由于缺乏理论基础和知识积累，现象的分析和结论存在很多问题。在此状况下，《汉字形体史》就显得尤为珍贵，可以说是首部有分量的汉字史著作。

《汉字形体史》以古文字形体史、篆文形体史为一组，汉隶形体史、八分形体史为一组，草书形体史（汉草、今草、章草等）为一组，真书形体史上下为一组，以翔实的资料作为佐证，四条线索，按照时代相互关联，清晰、透彻地叙述了汉字演变的整个历史，千头万绪、变幻莫测的汉字演变在作者的笔下变得清晰明了。该书最大的特点是系统梳理传统字学的各个名称术语及其内涵，以大量出土文献文字为依据，剖析毫厘，辩证是非，其内容蕴含着许多人们闻所未闻的见解，此举两事为例：

其一是书中对八分书的论证。八分是常见的书体，特别在清代以来写八分书的人很多，但是八分这名称，在汉代只见于蔡邕的说法，此外从没有人提到。汉代的八分不都是波磔的写法，相反波磔的写法主要是史书，相当于后来的楷书。八分主要特点不是波磔，而是古今杂形，这个“古”不是正篆，而是缪篆，缪篆是什么？不是错误之篆，而是优美之篆。它也不是古今过渡的字体，而是人造的存古字体。书中指出北魏朝廷把八分与真书结合造了一个元氏魏碑（习惯称魏碑），这个杂体的形体影响到北朝楷书，直到宋代才拨乱反正。人们一直认为八分是汉代的，叫汉隶，其实八分的高潮在汉更在唐，唐人才正式命名这类字叫八分，上至皇帝，下至文人，以书写八分为尊。诗人杜甫有诗《李潮小篆八分歌》曰：

苍颉鸟迹既茫味，字体变化如浮云。陈仓石鼓又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

秦有李斯汉蔡邕，中间作者寂不闻。峰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

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复得，吾甥李潮下笔亲。

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简单的几句诗，概括了八分来由、流传及唐代名家等，字字珠玉。

其二是对印刷术的论述。印刷术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它对汉字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印刷术为广泛传播知识、文化交流，提供了物质条件。从早期的雕版印刷发展到活字印刷，提高了效率，比效率更为重要的是完成了汉字字形标准化。雕版印刷是先写字后雕版，字体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手写体。宋元推崇颜体、欧体，元代有用赵体，明代又采用沈体。手写体各人各写，各人习惯不一，风格不一，字形难以一律。明代有司严格管理刻书，要求“各书一遵欽颁官本，重复校讎”，工坊为了提高劳作效率，规模生产，为了便于相互衔接，不仅统一字形，笔画横平竖直，多用方笔，出现了横平竖直的匠体字，因为发生在明代中期，也叫明朝字，或叫宋体。宋体出现后印刷物广为采用，是近代汉字标准化的由来。

《汉字形体史》规模宏大，内容全面，论述详赡，精彩纷呈，堪与《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同列，为传统文科的经典性通史著作。

追寻汉字里的天地之美

●王贵元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出自《论语·学而》，是孔子弟子有若的一句名言。意思是：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的事务，根本建立了，做人做事的原则方法也就有了。这里“本立”是前提，“道生”是结果，意在强调培根固本的重要性。

本，指事字，始见于西周金文，古字形在“木”的下部加一指示符号标明树根的位置所在，本义指树根。农耕时代，人们对农作物有着深厚的感情，认为植物的根部代表一切生命的起源，所以“本”字便有了本源、初始之意，用来比喻最基础、最核心的事物。

“本”是基础，基础巩固了，其它部分才能发展。柳宗元曾写有《种树郭橐驼传》一文，借用树的生长给出了做人从政的启示。其中讲到，很多人种不好，种不活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导致“木之性日以离矣”。以树说理，从反面阐释固本培根的重要性。正所谓“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

“本”与“末”相对，“本”是树根，“末”是树

枝，“本”是主，“末”是次，当面临复杂局面时，抓住了主要矛盾，细枝末节的小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从这个角度说，“务本”是科学的方法论。左宗棠在任陕甘总督期间，看到甘肃“民苦无衣甚于无食，老弱妇女衣不蔽体”。他下乡实地调研，发现当地土质适合种棉，又同百姓攀谈，大部分农民对预想的种棉收入也比较满意，于是左宗棠便提出了“教种桑棉为养民务本之要”，大力推广种棉。这个“务本”之策，增加了粮食生产，改善了百姓生活，自然也解决了贫困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

可见，“本”是核心、是关键、是第一要务，

抓住了“本”，就好比从千头万绪中抽出线团的头，根子找到了，脉络清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就产生了。1946年4月，抗日战争已经取得胜利，在延安召开的第三届边区议会第一次大会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提出，今后三年的三项建设任务，排在首位的是“经济为本”，之后是发展文化、发扬政治民主。事实证明，抓住了生产这个本，才有条件支持对敌斗争，其它很多困难才能得以解决。

在“本”上来下功夫，适用于各个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作风建设开局起步，把纪律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走的就是一个正

苏州古称姑苏，春秋时为吴国都城，晋称吴郡；唐武德时称苏州，为江南东道十八州之一。苏州自古便是江南重镇、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唐代来此游览和任职的诗人颇多，他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诗歌作品。李白、杜甫、王昌龄、常建、李嘉祐、张继等都曾在此留下诗篇。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还先后做过苏州刺史，因而刘禹锡诗云“苏州刺史例能诗”。

李白写苏州的诗远不如写扬州和金陵的，但《苏台览古》还是较有名的：“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只今惟有西陵曲，曾照吴王宫里人。”杜甫在《杜游》中也写到苏州古迹的荒凉景象：“王谢风流远，阖庐丘墓荒。剑池石壁仄，长洲荷茎荒。嵯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浪。”常建和张继的诗名虽然不如李、杜显赫，但他们在苏州留下的诗篇却广为流传，如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

诗中的“古寺”，即常熟兴福寺，常熟在唐代就属苏州，今仍是。诗中虽多写寺庙里的景致，然而“曲径通幽处”又写出苏州的城市风貌和园林特色。这是欧阳修生前最喜欢的诗之一，他尤赏颔联，欲效不能。纪昀也认为此诗“气象深微，笔笔超妙，此为神来之候”。张继的《枫桥夜泊》显然名气更大、流传更广，此诗因声调悠扬而被清人管世铭推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之一，也可说是描写苏州最出色、流传最广的诗篇之一。唐人七绝佳作如林，唯有此首在日本流传最广，更有人因读此诗而来苏州一游。当年的寒山寺在苏州城外，而如今早已成苏州城内的名胜之一了。

后来白居易任苏州刺史，也写下一些吟咏苏州的诗，其中《登阊门闲望》较有代表性：“阊阖城西铺秋草，乌鹊桥红带夕阳。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当时诗人身体欠佳，只不过偶登阊门城头闲望一下，便把当时苏州城的历史、经

济、环境、民俗、名胜统统囊括，尽显笔底。也许因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上政事清简，他辞职离开时苏州市民依依不舍，挥泪告别，刘禹锡在《白太守行》中对此有所描写：“闻有白太守，抛官归旧谿。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

连刘禹锡自己也没想到，5年以后，他也来做苏州刺史了，而且任职时间比白居易还长，留下的写苏州的诗比白居易还多。辞职离开苏州时，他也是依依不舍，写下《别苏州》二首，其二云：“流水阊门外，秋风吹柳条。从来送客处，今日自魂销。”他对苏州的感情尽泄纸上，读来倍觉情深意长。

还有一位对江南吴地特别欣赏的诗人，是唐末五代的杜荀鹤。他不仅自己在此游览生活，还经常热情地推荐友人前来，如《送人游吴》就是专门介绍苏州风情的：“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杜荀鹤身处战乱动荡、民不聊生的唐末，诗多哀叹之音，但每写到吴地江南总有几分眉飞色舞的样子，《送人游吴》用几句话便写尽苏州独特的水城风光和民情风俗，可谓唐代最后一首描写苏州的佳作。

二
远在东汉、西晋时，上海便属吴郡。如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籍贯通常称吴郡华亭，即今上海松江區。唐设苏州，其州府仍

“吴越古今路”上诗意长

●孙琴安

在吴郡，如今上海的大部分地区当时都属苏州管辖。刘禹锡当年赴苏州任刺史时就写有《赴苏州酬别乐天》一诗，其中两句可以为证：“梁氏夫妻为寄客，陆家兄弟是州民。”意为来自华亭的陆机、陆云兄弟都曾是苏州“州民”。

1000多年前的唐代尚未有上海之名，因此唐代诗人凡来沪地，多将松江之名写入诗歌。如唐代诗人刘长卿在安史之乱后自洛阳避难江东，漫游江南吴越诸地，路过松江时曾写过《松江独宿》一律：“洞庭初下叶，孤客不胜愁。明月天涯夜，青山江上秋。一官成白首，万里寄沧洲。久被浮名系，能无愧海鸥。”他写出一首宿松江的所见所感和所思所念。稍后有位德诚和尚，从四川子然一身来华亭定居，常泛一叶小舟，往返于华亭、朱泾之间，接送四方来客，随缘度日，并在此留下不少诗篇。据宋人吴聿《观林诗话》载：“华亭船子和尚诗，少见于世，吕益柔刻三十九首于枫泾寺，云得其父遗编中。”所谓“船子和尚”就是德诚和尚，他除了撑船运客便是垂钓，故所作诗作也多为渔人水上生活，如《船子和尚诗》中的七绝，“三十年来海上游，水清鱼现不吞钩。钓竿尽尽重栽竹，不计计程得便休。”

与德诚和尚差不多同时代的张聿甫曾在此任华亭县令，今存诗仅7首。他的作品虽不如德诚和尚多，但他毕竟是华亭最早的地方长官之一。从他所写的《圆灵水镜》《景风扇物》等

诗来看，特别是“何处青蘋末，呈祥起远空”“菱花凝泛滟，桂树映清鲜”诸句，都颇有江南水乡的意蕴，但是否写于华亭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张聿之后，刘禹锡赴任苏州刺史，他所写的《松江送处州奚使君》一诗可以证明他到过松江：“吴越古今路，沧波朝夕流。从来别离地，能使管弦愁。江草带烟暮，海云含雨秋。如君五陵客，不乐石门游。”从首句“吴越古今路”来看，当时的松江尽管多为“沧波”“江草”“海云”，却是由吴入越的交通要道，全诗寓情于景，深婉有致。刘禹锡还写过名闻天下、为华亭所独有的华亭鹤，《鹤叹二首》有云：“故巢吴苑树，深院洛阳城。徐引竹间步，远含云外情。”“丹顶宜承日，霜翎不染泥。爱池能久立，看月未成栖。”古来写华亭鹤的诗很多，《鹤叹二首》无疑是其中的名篇。

许浑在松江留下的诗篇较多。其《松江怀古》中“云移山漠漠，江阔树依依。晚色千帆落，秋声一雁飞”的句子写出了昔日上海的特殊景致，有趣的是，许浑的友人张祜也写有《松江怀古》，其开篇云：“碧树吴洲远，青山震泽深。”与刘长卿、刘禹锡、德诚和尚笔下的风光大致相符，据此亦可见唐代松江风貌之一斑。

与松江有缘的还有“皮陆”，皮日休与陆龟蒙。两人都写过华亭鹤的诗，皮日休一写《松江早春》，陆龟蒙立刻写了《和袭美松江早春》。陆龟蒙辞官退隐后居住在松江甫里，多所论撰。那年吴中天下疫，皮日休写了《吴中苦雨因书一百韵寄鲁望》（陆龟蒙字鲁望），其中的“全吴临巨溟，百里到沪渎。海物竞骈罗，水怪争参差”反映了这一带水灾时的特殊地理状况，当时这也已是一条重要的水上通道。由此想到杜荀鹤的《送友游吴越》：“去越从吴过，吴疆与越连。有园多种桔，无水不生莲。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此中偏重客，君去必经年。”

沪属吴地而在吴越之间，诗中所写种种风情，至今仍值得玩味。